

中国古代文学
史科学要论



刘刚 赵春秀 著



一本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科学的著述
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史科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辽海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要论

刘刚 赵春秀◎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要论 / 刘刚, 赵春秀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9.5 (2018.3 重印)

ISBN 978-7-5451-0400-4

I. 中… II. ①刘…②赵… III. 古典文学—史料学—研究—中国 IV. K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7950 号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要论

责任编辑 徐桂秋

责任校对 刘娟娟

开 本 155mm × 23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辽海出版社

印 刷 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51-0400-4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学家传记史料的搜辑与整理	10
第一节 文学家传记史料的搜辑范围与对象	11
一、正史与别史	11
二、别传与墓志	15
三、方志与谱牒	20
四、目录著作及其提要	25
五、类书、杂抄与笔记	31
六、序跋与作家小传	39
七、作品及其题目、自序、自注	42
八、年谱与辞典	45
九、报刊中作家传记研究论文	51
十、传记史料综合索引与新出传记著述	54
第二节 文学家传记史料的整理方法	57
一、史料的鉴别	58
二、史料的比排	66
(一) 排比法	67
(二) 联络法	69
(三) 配比法	72

(四) 比勘法	73
三、史料的组合	74
(一) 设定研究目标和编排体例	74
(二) 按照编排体例次序排列史料	75
(三) 将有序排列的史料作出纲目	75
第二章 文学作品史料的搜辑与整理	76
第一节 文学作品史料的搜辑范围与对象	76
一、总集	77
(一) 诗歌类总集举要	78
(二) 词曲类总集举要	81
(三) 辞赋类总集举要	88
(四) 散文类总集举要	91
(五) 小说类总集举要	95
(六) 综合类总集举要	98
二、别集	100
(一) 汉魏六朝别集举要	101
(二) 隋唐五代别集举要	106
(三) 两宋别集举要	113
(四) 金元别集举要	118
(五) 明清别集举要	120
第二节 古代文学作品的检索、校勘与辑佚	128
一、古代文学作品的检索	129
二、古代文学作品的校勘与辑佚	135
(一) 校勘	136
(二) 辑佚	142
第三章 古代文学理论史料的搜辑与整理	148
第一节 古代文学理论史料的搜辑范围与对象	148

一、文学理论专论专著举要·····	149
(一) 古代文学理论著述中的重要专论·····	149
(二) 古代文学理论著述中的重要专著·····	154
二、含有文论成分的序跋、书信举要·····	185
三、论诗诗与诗赋序举要·····	198
四、诗文评点与解题、史评举要·····	208
第二节 古籍的版本与鉴定方法·····	221
一、版本的类型·····	222
二、装帧与版式·····	224
三、版本的鉴定(甲)·····	226
四、版本的鉴定(乙)·····	234
五、版本鉴定的功用·····	238
主要参考书目·····	244

引 言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是历史史料学的分支学科、专门学科。历史史料学旨在研究历史资料的发掘、搜集、分析、整理与运用的规律，古代文学史料学旨在研究文学史资料的发掘、搜集、分析、整理与运用的规律，二者的研究对象有广与狭、全与专的不同，而研究的目的是是一致的。史料学与传统的文献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诸如史料的发掘与搜集与目录学、版本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可以利用目录学的学术成果去检索，去发现古代文献中遗存的史料，而史料的搜集依托于一个好的底本，这就要利用版本学的理论与方法。又如史料的分析与整理与辨伪学、校勘学、辑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史料的真实性是史料的生命，如何鉴别史料的真实与否，这当然离不开辨伪学；由于传抄、翻刻等历史的原因，古籍中的讹误在所难免，然而要避免讹误，还史料本来的正确的面貌，这就离不开校勘学；在古代古籍的散佚相当严重，有些有价值的古籍若已散佚，那就需要辑佚，况且有关一个问题的史料往往散见于多种古籍之中，这也离不开辑佚学。文学史料学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因此，学者们在阐述文学史料学学科内容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传统文献学学术构架。例如，潘树广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分为“史源论”、“检索方法论”、“鉴别方法论”、“文学史料分论”、“编纂方法论”、“现代技术应用论”六个模块，而徐有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要论

学史料学》分为“文学史料类型”、“文学史料鉴定”、“文学史料整理”、“文学史料检索”四个方面。对于文学史料学发展来说，从目前的现状看，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着眼于文学史料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如潘树广、徐有富的文学史料学著述；另一种是着眼于对具体的文学史料的介绍，傅璇琮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中说：“通论性的著述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想，为了使读者具体掌握文学史料，还是按时代、按作家作品系统地论述较切实用，因此我们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时代分（但不拘泥于某一朝代），一种是以文体分。既概括地叙述各种史料，以史料介绍为主，也可以从学术史角度，论述历代的治学思想和研究实绩，把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自1996年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已陆续出版了穆克宏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曹道衡、刘跃进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陶敏、李一飞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洪湛侯的《诗经学史》，马积高的《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王兆鹏的《词学史料学》，推进了文学史料学研究的深入。这两种途径，对于文学史料学的构建、研究与发展都是开创性的，意义重大。然而，从古代文学史料学的阐述、推介与教授的实际内容说，前者主要侧重于方法论的讲解，后者则更注重史料性著作的介绍，虽各有专长，但也各显其不足，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觉得，则将更有益于教学，特别是有益于针对古代文学初学者的教学。出于这一想法，我们在文学史料学教学中做了一些尝试，一方面借“史料的搜辑范围与对象”介绍前人的史料性著述，一方面借“史料的整理方法”讲述方法论的问题。几年的教学过后，颇觉得这一节一章积累成的讲义，或许对文学史料学的构建有些许意义，于是便将它整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以方便于学生。

以目前大学生或研究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现状而论，总体情况不容乐观。程千帆先生的高足徐有富在《文献学研究》所收《程千帆与〈校雠广义〉》一文中，谈到了程先生对这种现状的描述：“多年来，学生多半注意接受老师们传授的知识，而不够注意学习老师们获得知识的方法。每位老师都有一个知识仓库，学生往往等老师将仓库打开，拎着口袋去装，而并不一定会想到应当自己去打开。研究生如果还不注意这一点，他们获得的知识将是有限的。”程先生所描述的这种现象，在全国各个高校中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应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觉得应该从学生和老师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调动学生主动学习治学的方法，一方面强调老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方法论的讲授，不仅要开设专门的课程，而且要指导学生进行必要的实践。然而在这两个方面之中，老师当是关键。清代校雠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明确地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诚如王鸣盛所言，目录学是治学入门的途径，那么入得门后，若要“登堂入室”，更进一步，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料学，它是学术研究的根本途径。中国传统的学问，讲究“以实证为本，无证不言”，那种借西方的某个理论、举中国的几个例子做学问的方法，多属于“无根之谈”。我们把话再说回来，王鸣盛所说的“入门”的目录学，“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作为“登堂入室”的史料学，岂不更有甚乎！靠学生“苦学精究”的自学谈何容易，实当以“苦学精究”之精神“质之良师”，方可有成。故老师是为关键。因此，我们觉得面对着渴望知识的学生，肩上担负着一种推卸不去的责任。

关于史料的认知，古代有成就的学者都极为重视。春秋时的孔子就根据鲁国保存的史料撰写了《春秋》，并对史料表现出极

其重视的态度，他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种重“文”（典籍）重“献”（能言古礼的人才）的态度，反映的是“无证不言”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在《论语·子路》中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汉代的司马迁更将这种重视史料的精神付诸于《史记》的撰写之中，他不仅“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广泛地搜集典籍中的历史资料，而且注重实地的考察，其《太史公自序》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无疑是在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田野资料。古人重视史料，不仅仅限于学者，政治家、文学家也非常重视史料，唐代的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和宋代的《太平御览》就能说明问题，这些类书分门别类汇编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供政治家以史为证议论政事，供文学家以史为典抒写情性。可以说注重史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恒久的传统。然而，关于史料问题，在清代以前，古人也让我们有所遗憾。我们在悠久的古代史中，看到的只是古人重视历史资料的精神和在这种精神驱使下形成的学术成果，而很少能够读到古人搜集史料、整理史料、运用史料的经验总结，或较为具体的经验之谈。这可能是清以前的古人，不善于总结经验，或对治学经验的认识不足；也可能他们对治学的经验本有所总结，而是出于师承门户的狭隘意识而秘不外传。这种令人遗憾的文化历史直到清代校讎学繁盛起来才逐渐有所改变。清代校讎学的繁盛与国学大家戴震的提倡有关。他论学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这一以识字为求学之第一要义的提倡，带动了校讎学的

发达。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本朝学派，以经学考据为中坚，以为欲求经义，必当假途于文字也，于是训诂一派出。以文字与语音相连属也，于是音韵（古音）一派出。又以今所传本之文字，或未可信据也，于是校勘一派出。以古经与地理多有关系也，于是地理一派出。以古经与天算多有关系也，于是天算一派出。以古代之名物制度与今殊异也，于是名物制度一派出。是为乾嘉时代最盛之支派。言声音训诂学，而以汉以后字书为未足也，于是金石一派出。言地理而以域内为有限也，于是西北地理一派出。以今传之经籍为未完备也，于是辑佚一派出。崇古尊汉之极点，而以东汉之学术，其导源更自西汉也，于是今文经说一派出。是为乾嘉以后续兴之学派。”在戴震倡导下而兴起的这些学术支派，其中有些如训诂、校勘、辑佚等就属于校雠学的范畴。程千帆在《校雠广义叙录》中说：“盖始有校雠目录之事，继有校雠目录之名，终有校雠目录之学。”就在乾嘉学潮之中，校雠之学实已兴起，章学诚有《校雠通义》一书，实为当时校雠学集大成之作，其卷一专论目录之学，指出目录学之宗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出目录编制要注意“互著、别裁”二法，主张分类应重图书内容，著录要写类叙和提要。其后，校雠学备受学人重视，研究者继而蜂起，不过其学之名称时有变化。清末张之洞称校雠学为目录学，著有《书目答问》一书，是书主张“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也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并将章学诚提倡的“互著、别裁”二法付诸实践，分类著目，提要叙录。更应强调的是，《书目答问》特重版本，于书目之下往往评价其书版本之精粗优劣。他告诫学者：“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到了20世纪30

年代，校雠学又被称为文献学。其称谓始于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当代学者张君炎在《中国文学文献学》一书中评价说：“郑鹤声、郑鹤春在1930年所编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了‘文献学’的名称，并在‘例言’中援引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文献’一词的解释后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就其全书内容看，他们所说的‘文献学’是指考订和论述古籍图书在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翻译、版本和印刷方面的源流和概况。涉及了古籍的分类目录、点校整理、经籍传授、编纂、版本和刻书源流等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古籍整理、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由于“文献学”的名称较之校雠学、目录学更能概括此门学科的内涵，因而成为此学之定名。从校雠学、目录学到文献学，在名称的嬗变中，反映了这门学科的不断成熟，研究内容的确定，研究方法的总结，使治学之中的治书之学的方法规律得以公布于世。这就为史料学的兴起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基础性支持。我们的这本小册子在讲解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就借鉴了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成果。

然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给予史料学以更重大、更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古代史学家关于史料的考异实践。其对史料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史料甄别与运用方面。古代史学家的史料考异实践，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采摭繁复，往往书写一事要参考比对三、四种史料。古代稗官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为实录，期间传闻异词，势所难免。司马光对于收集的史料，既择其可信者而从之，又参考异同，辨证谬误，以明去取，如此累积，别成《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司马

光的考异方法，可谓是开创了史料比对法。其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效其法，不论实录、正史或杂史、小说，皆以为取材对象，然后精心考订，细致鉴别，取其可信之材料。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考订史实，亦用其法。对于司马光以来“史料比对法”进行系统总结的是近代的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专门设列了“说史料”和“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两章，将史料的问题提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他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并详细论述了史料价值、搜集史料的途径、搜集史料之法、鉴别史料之法。梁启超关于史料的论述，可以视为对于史料学的草创，而真正提出“史料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是稍晚于梁氏的傅斯年。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又强调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同时又从“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史的史料”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史料的价值，鉴别的方法和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虽然傅氏“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提法未必完全正确，但其对史料学的提倡之功，功不可没。在傅氏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许多史料学方面的著述，如独立出版社1944年出版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料与史学》，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出版有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中华书局1949年出版有管听石的《中国史读法》，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有胡厚宣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 1962 年出版有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出版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编》，三联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有刘建国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北京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有陈高华、陈志超的《中国古代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有黄永年、贾宪保的《唐史史料学》，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有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有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有谢国祯的《史料学概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有荣孟源的《史料与历史科学》。在近百年史料学的发展之中，史料学的理论不断地科学化，史料学的方法研究不断趋向细腻完备。从广义的历史学而言，文学史涵盖在历史之中，类推可知，文学史科学亦当从属于历史史料学，因此，前人总结概括的史料学种种方法自然适用于文学史科学。所以，我们在文学史料的运用方面全面地借鉴了历史史料学的整理史料的方法。

关于史料，梁启超分为两类：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傅斯年也分为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见《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梁、傅二氏虽分类的名目不同，但各类所指大体一致。第一类指地下出土的文物和古代官府、庙宇及世家的传世文物；第二类指文字记录下来的流传于世的以简牍帛书刻板刷印为载体的古籍文献。按照这种分类，讲述史料，二者理应兼顾，而且应该特别注重第一类史料。然而，我们在这本小册子中，对第一类史料没有涉及，其理由有二：一、我们教授的对象是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这类的学习者处于初学阶段。傅斯年认为：“新发现的直接史料与自古相传的间接史料相互勘补的工作，必于旧史史

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为此，新近出土或发现的新史料（即直接史料），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把握，所以认为让初学者了解有这一类史料就可以了，至于运用则有待于初学者水平的提高。二、第一类史料有关文学史料的不多，且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整理，并将其成果发表或刊行，初学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不必一定直接去研究原始资料。对于这样的处理，我们以为合乎教学的实际需要，正确与否还请同行批评。同时，我们在处理第二种史料的时候，又出于古代文学史料学的特点，将这类史料分为有关作家传记的史料、有关文学作品的史料、有关文学理论的史料和文学创作的文化历史背景史料。不过我们在讲述时，只讲述前三种，而没有涉及第四种，即文学创作的文化历史背景史料。我们这样处理的想法是：一、文化历史背景史料涉及的极为广泛，如对于哲学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科学史、军事史、民族史等等史料均在涉及之列，俨然就是广义的整个的中国历史史料。我们的这本小册子要囊括如此庞大的内容，恐怕力不从心，或者说难以做到，若概述式地讲一讲，也只能蜻蜓点水，解决不了问题。二、自史料学兴起以来，广义历史上的史料，已有许多专书进行整理与介绍。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段已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我们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已有的哲学史料学、历史史料学的成果，去解决关于文化历史背景史料的需求。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这本小册子仅设三章进行讲述，即第一章文学家传记史料的搜辑与整理、第二章文学作品史料的搜辑与整理、第三章古代文学理论史料的搜辑与整理，目的是使初学者初步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基本知识。拳拳之心皆在于斯。

第一章 文学家传记史料的搜辑与整理

一般来讲，文学研究的史料准备工作有四大要务：一是文学家传记史料，二是文学作品史料，三是文学思想史料，四是文学文化背景史料。此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关于文学家传记史料，古人非常重视，《孟子·万章下》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著名的“知人论世”说。虽孟子在这里讲的是修身的问题，是今人如何了解、学习古人的问题，但其中“颂诗”、“读书”、“知人”、“论世”的条件关系的阐述，对文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将“知人论世”与孟子的另一著名学说“以意逆志”联系起来，他说：“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王国维直将“知人论世”当作了“以意逆志”的前提条件和有效方法。那么，如何获取文学家的传记史料呢？下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第一节 文学家传记史料的搜辑范围与对象

一、正史与别史

先秦的史书，传世的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这时的史书，或重在记事，或重在记言，还未能将人作为记史的中心内容，所以还不能为我们提供直接的集中的文学家传记信息。

在汉代，自《史记》《汉书》产生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正史的纪传体撰写体例。《史记》是纪传体的通史，《汉书》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而后的历代正史则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纪传体的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历史事件，这便为我们搜辑文学家传记史料提供了方便。

《史记》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列传记事有四种类型，一是一人一传，称“单传”；二是两人以上的各自传记编在同一篇列传里，称“合传”；三是在一个人的传记后附载他人事迹或传记，被附载者称“附传”；四是同类人物的各自传记编在同一篇列传里，标以与其类相应的名称，称“类传”。司马迁的《史记》，虽还未能将文学家独立分类，但先秦诸子和汉初的著名文学家在该书中均有收录，唯详略有异。

班固《汉书》，基本沿袭《史记》体例，仅改“书”为“志”，并“世家”于“列传”，分纪、表、志、传四部分。《汉书》体例上的这些变化，为后来正史所沿用，成为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基本格局。虽然《汉书》也未能将文学家独立分类，但设《儒林传》和《艺文志》，已有了将文学家独立分类立传的倾